



中国藏西夏文文献新探

史金波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的一个重要王朝(1038~1227年),正式立国前夕创制了记录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语言的文字,当时称为“蕃文”,后世称为西夏文。西夏文创制后在境内广泛使用。西夏文的创制和应用是西夏文化发展的重要特点。西夏文随着西夏的灭亡而逐渐消亡,明、清以降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一百年前世上竟没有一本西夏文书籍。西夏这样一个重要王朝的历史并未列入中国“正史”之中,致使有关西夏的汉文史料十分贫乏。所幸近百年来西夏文文献不断出土,给西夏研究带来转机。

自20世纪初以来,先是俄国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于1908~1909年,率领探险队在中国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发现了大批文献和文物。其中以西夏文文献最多,共有数千卷册。这些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献长期封藏于俄国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后来英国人斯坦因(A.Stein)、法国人伯希和(P.Pelliot)、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hedin)都自中国获得数量不等的西夏文文献。

其实国内存藏的西夏文文献也很丰富。1917年宁夏灵武县知事余鼎铭修城时,于城墙内掘获出两大坛西夏文文献,多数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少部分辗转传藏于故宫博物院、甘肃、宁夏,一部分流失于日本等地。

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的敦煌石窟、天梯山石窟和炳灵寺石窟,武威小西沟峁和亥母洞,内蒙古的黑水城和绿城,宁夏的贺兰县宏佛塔、贺兰山方塔以及陕西、新疆等地又陆续发现和收藏不少西夏文献。这样全国所藏总计在万面以上,皆为珍贵古籍,多以善本入藏,是西夏研究的重要资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引起专家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过去对国内所藏西夏文献,虽进行过整理,并编制目录,进行考释,但从未系统、全面刊布出版。因为这些文献分散各处,并深藏密库,国内外专家查找、利用十分不便。宁夏大学在2001年将编纂、出版《中国藏西夏文献》申报为教育部重点基地项目,得到批准。2004年宁夏大学、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等全国各地十几个部门,共同出版《中国藏西夏文献》,以便利用这些文献弘扬学术,推动研究。

《中国藏西夏文献》系大型系列文献丛书,将分藏各地的西夏文文献制成清晰的图片出版,提供珍贵原始文献,同时对各地文献分别以“综述”介绍,对每一文献又有“叙录”记其形制、内容。该书分北京编、宁夏编、甘肃编、内蒙古编、陕西编、金石编。北京编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卷;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藏卷;宁夏编包括宁夏博物馆藏卷、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卷、罗雪樵藏卷;陕西编包括西安市文物局藏卷;甘肃编包括敦煌研究院藏卷、甘肃省博物馆和定西县文化馆藏卷、武威博物馆藏卷;内蒙古编包括内蒙古博物馆藏卷、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和额济纳旗文化馆藏卷;金石编包括西夏陵残碑卷、碑刻题记卷以及官印、符牌、钱币卷。^①

① 史金波,陈育宁总主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20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2006年。

在笔者从事西夏研究的 40 多年中,对国内各地所藏西夏文文献大多数作过调查、整理和研究。在此次修复和出版过程中,笔者作为总主编之一,重新进行整理和研究,又有新的收获和体会,一些心得已经注入《中国藏西夏文献》的“综述”和“叙录”中,但由于统一体例的限制,一些对文献的认识、研究又未能在书中得到反映,现择其部分分述于下。

一 元代曾在建康(南京)印刷西夏文佛经

蒙元时期西夏人称作河西人,为色目人一类,有相当高的民族地位,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元代尚使用西夏文,被称作河西字。过去知道元代曾在杭州刊印西夏文佛经。根据元平江路磧砂延圣寺刊印的《大宗地玄文本论》卷 3 发愿文记载:“管主八誓报四恩,流通正教,累年发心,印施汉本大藏经三十余藏,四大部经三十余部……心愿未周,钦睹圣旨:‘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刻河西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华严诸经杆板,至大德六年完备。’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余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余部,施于宁夏、永昌等寺院,永远流通。”^①管主八原是西夏后裔,任松江府(今上海)僧录,其名为藏文译音,意为经学大师。这一记载确切地印证了元代曾雕刻西夏文大藏经以及其他单部佛经的事实。有元一代多次印刷西夏文大藏经。近年敦煌北区发现的西夏文刻本佛经残页《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经末有一长方形压捺印记,上有汉文两行:“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师利塔中永远流通供养。”^②此题款证实管主八主持印制西夏文大藏经,并施于敦煌佛塔中。可能在他所施经中都押捺这样的印记。此外管主八对刊刻《普宁藏》《磧砂藏》也贡献很大。^③

国家图书馆藏有西夏文刻本《慈悲道场忏罪法》,存卷 1、3、4、5、6、7、8、9、10,共 9 卷,缺卷 2。经折装,原各卷皆有封面、题签,卷首皆有梁皇宝忏图一幅 4 面,现有的部分残损,图右有汉文“俞声刊”3 字。后有佛名 4 面,卷前经名后有译者题名,译文为“天生全能禄蕃式法正国皇太后梁氏御译,救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译”,是为西夏惠宗母梁氏和惠宗的尊号。俞声是元代杭州地区刻工,曾为宋两浙茶盐司雕刊的《礼记正义》和杭州刻本《尔雅疏》补板。^④可证馆藏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的《梁皇宝忏图》为元代刊印。那么,此经是在哪里刻印的呢?

在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卷 1 序文最后一行下有西夏文双行小字刻款,每行 11 字,译文为“此忏罪法出处地界者江南金陵建康府城中奉敕所集”。^⑤南宋和元代都曾设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市),但南宋与西夏各为王朝,西夏是从宋朝分裂出去而建立的国家,宋夏关系历来紧张,曾发生多次战争。宋朝不仅不承认西夏是独立王朝,还不承认其文字。双方战争中宋朝还以西夏文书作为战利品。康定初(1040 年),宋大将仁福攻陷西夏白豹城“悉焚其伪署李太尉衙署、酒税务、粮仓、草场及民居室、四十里内禾稼,积聚诸将分破族帐四十一……虏牛、马、羊、橐驼七千余头,器械三百余事,印记六面,伪宣敕告身及蕃书五十通”。^⑥所谓“伪宣敕告身及蕃书五十通”应指西夏文字文献。西夏以西夏文上表,宋朝拒不接受。宋元丰元年(1078 年)西夏使臣到宋朝,“以蕃书附之入谢”。“蕃书”即西夏文。宋接待官员赵戡收下谢表,宋神宗下诏毁书表,并令开封府治赵戡之罪。^⑦可见宋朝对西夏文的忌讳,从未见在宋朝境内刊印西夏文文献。因此宋朝不可能在建康府印西夏文佛经。

元代是大一统国家,西夏地区已成元朝的一部分,西夏党项后裔成为地位较高的色目人,西夏文为当

① 该卷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山西崇善寺和日本善福寺也入藏是经。

②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 年 3 期。第 1~16 页;《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6 册,第 148 页。

③ 陈高华:《元代南方佛教略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 2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312~324 页。

④ 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283 页。

⑤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4 册,第 91 页。

⑥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 12,中华书局点校本,1989 年。

⑦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96,中华书局,2004 年。

时行用文字之一。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在大都北居庸关的通道上,修筑了一座著名的过街塔。在过街塔门洞内的高大石壁上,用6种文字镌刻了陀罗尼经,西夏文为其中一种,有77行。其余5种是汉文、梵文、八思巴文、藏文、回鹘文。无独有偶,元代另一方有西夏文字的六体石刻,即莫高窟速来蛮西宁王的梵、藏、汉、西夏、蒙古、回鹘文的六字真言碑,建于至正八年(1348年)^①。这是元代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晚的西夏文字资料。笔者曾到甘肃省永昌县的西夏圣容寺附近考察,其山冈左侧河崖山石上也见以西夏文等上述6种文字镌刻的六字真言。^②这些石刻反映出元代多民族文化的典型特质,表现出党项人及其文化在元朝的地位,说明当时汉文、八思巴文、藏文、回鹘文、西夏文都是国家认可的通用文字。

因此可以肯定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是在元代雕印。“此忏罪法出处地界者江南金陵建康府城中奉敕所集”,所谓“出处”“集”者,应为集结印刷出版之意。

此经高32.8厘米,宽13厘米,上下双栏,栏高27.9厘米,面5行,行15字。馆藏元代在杭州刊印的西夏文佛经多种,一般高33厘米,宽12.2厘米,上下双栏,栏高23.8厘米,面6行,行17字。此经栏高且行少,字体硕大,每字约2厘米见方,而杭州刻经字体较小,约在1.2厘米见方。两相对照可见版式的明显区别,这可作为不同时间同地刻经的佐证。

元代除杭州外还在建康译经,说明元代西夏文字和西夏文佛经的继续流行并不限于一时一地,当时不仅是因在杭州有党项人杨琏真伽这样炙手可热的释教总统能刊印佛经,在其他地方也有刊印佛经的可能,这对认识元代西夏文佛经的印制、流行有重要意义。

二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刊印地点

国家图书馆藏有西夏文刻本《金光明最胜王经》,为蒙元时期刻本。存卷1至卷10共15卷,其中卷1、4、5、6、10有复本,缺卷2、7。

此经经折装,卷首有佛画4面,有的卷遗失;有画像记1或2面。卷1有忏悔灭罪记18面,面6行,行17字。流传序10面,面6行,行16字,题款译文为“兰山石台岩云谷慈恩众宫一行沙门慧觉集”。“兰山”即贺兰山。“慈恩众宫”即慈恩寺,是贺兰山中的一座寺庙。一行沙门慧觉是夏末元初的高僧,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的录传者,也是大夏国弘扬《华严经》诸师的最后一位。^③经题后校经题款译文为“奉白高大夏国仁尊圣德珠城皇帝敕重校”。“仁尊圣德珠城皇帝”为西夏仁宗尊号。流传序记载了《金光明经》流传东土后先后五次由梵文译为汉文的经过,还特别记述了西夏时期翻译、校勘此经的经过以及在西夏倡导、传播此经的情况,“后始奉白高大夏国明盛皇帝、母梁氏皇太后敕,渡解三藏安全国师沙门白智光,译汉为番”。指出惠宗时由国师白智光从汉文译成西夏文。最后还提及西夏灭亡后此经的遭遇与序言作者的发愿。此经卷10末尾有刻印跋文及人名4面,跋文汉译文为:

今释迦圆寂,付法传而至于今时,佛法住盛荣者,以此经是。故大界国世界信众施主陈慧高,念此语故,发出大愿,番国旧印板国毁中失,因此施舍净物,令雕新字,乙巳年八月十五日始起,丁未年中刻毕,净纸上得以印施。以此善根,上报四恩,下救八苦,德法重盛,佛事为新。慧高等十恶五罪孽令灭,三恶八灾苦极莫受。欲现最安生,而成佛道也。^④

跋文记载了刊印时间起自乙巳年,完成于丁未年,应是蒙古乃马真称制尚无年号的1245~1247年。^⑤跋文中的“大界国”即指疆界宽广的蒙古国,“世界”在西夏文中有二解,一是指时空意义的世界,二是指“朝廷”“京师”意。在西夏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多种条文中“世界”二字是“京师”之意。这时的京师是否是蒙古的京师大都呢?大都元太祖成吉思汗十年时(1215年)已被蒙古军占领,太宗窝阔台七年(1235年)方置版图,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年)成为中都,始为元朝首都,九年(1272

① 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9年,图118。

②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册。

③ (元)一行慧觉录:《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卷4。

④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4册,第85页。

⑤ 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3期,第90~111页。

年)改为大都。乃马真称制时,蒙古首都尚在开平,当时不可能在那里印刷西夏文佛经。因此这里的京师很可能是指西夏的旧都中兴府,即现在的银川市。跋文提到“番国旧印板国毁中失”,番国即指西夏,可能因在西夏故地,对西夏文《金光明经》在国家灭亡的战乱中损毁记忆犹新,并带有怀旧情感重新雕印此经。其主要发愿者陈慧高,似为一汉姓僧人,但在发愿人名中出现的人名中除部分汉姓外,还有很多党项人姓。如兀则慧刚、讹利慧德、折木氏三姐、酪布氏成舅、没西慧会、讹慧盛、讹二氏福德子、多氏导导、叶移则布氏冬冬、契没朱迦鳩等。

三 国家图书馆藏泥活字版西夏文文献的整理、分析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分上下两卷(编号3.15、3.16),皆是残本,因其断折严重,背面以其他废弃经纸裱糊。裱糊用纸不止一种,其中有西夏文泥活字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51、71两卷,面高32.3厘米、宽12.1厘米,上下单栏,栏高26厘米,面6行,行17字。卷51仅存2面(编号3.15、3.16各1面),此外尚有两残纸。这些页面无任何经名、页码标志,系依据经文内容认定的。卷第71存44面,也分属3.15、3.16两个编号,因系裱糊用纸,裱贴混乱,经仔细核校经文,方理清顺序,并知所缺页面。有的页面未能从被裱糊页上揭开,将正面粘贴于被裱糊页后面,仅从背面看到反字。此卷按佛经内容将原图版顺序重新调整如下(方括弧内为图版原编号):3.15号的首2页、[24 25B](重复1行)、[22 23B]、(下缺1面)、[04 05](背面)、[34 35B](背面)、[24 25B](背面)、[38 39B]、[37B]、[36B]、[26 27B]、[28 29B]、[42 43B]、[40 41B]、[44 45B](下约缺30面),下接3.16号[38 39B](右2行)(下约缺6面)、[05 06B](左6行)、[03 04B]、[07 08B](左11行)、[05 06B](右9行)(下缺1面)、[17 B](右6行)、[11 12B](下缺2面)、[07 08](右4行)、[15 16B]、[13 14B](下约缺10面)、[25 26](左11行)、[23 24](下约缺10面)。完整经文约104面,此经存44面,约缺60面。

该经经题后有译、校经题款,译文为“唐于闐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悖睦懿恭皇帝御译”。题款下有朱色宝塔式梵文押捺印记。

又馆藏西夏文残页中还有泥活字本《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3的一面,存5行(1、5行仅存半行)。^①

原已知国家图书馆藏有西夏文木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共63卷,其中有的有复本,不重复者52卷。这些佛经的活字本特点已有论列。但观《现在贤劫千佛名经》背面裱糊的上述活字印本,与此63卷活字本相比较,则又有明显的不同。

观察这些文献的版面、字迹,具有泥活字印刷特征。其中很多字笔画中间断折,不少字有明显的笔画缺损痕迹,有的字边缘不整齐,有断残现象。仔细观察,不少于三分之一的字有笔画断缺现象,这在木活字印刷品中是不会发生的。甚至有的字由于缺角而显得近于浑圆,有的笔画中有类似气泡、沙眼的痕迹,有的文字模糊,字的边缘形成蜡泪状,这是烧制活字时温度太高,造成的流釉现象所致。这些都体现了泥活字印刷的特点。

中国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②,这是印刷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然而中国早期活字印刷实物在中原地区都没有保存下来。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不久,西夏人便开始使用泥活字印刷,并由泥活字发展到木活字印刷。此前只知一种西夏文泥活字印刷品《维摩诘所说经》,此经内蒙古黑水城遗址和甘肃武威市亥母洞遗址都有出土,分别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武威市博物馆。

2005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宁夏山嘴沟石窟发现大量西夏文献,其中有《妙法莲华经集要义镜注》《圆觉注之略疏》为活字印本,不仅从印面可见活字印刷的特征,前者还有印经题款,记录了参与印制该经的人名,同时披露了当时的分工,如校印面者、拣(选)印字者、做活字丁者、印本者,这就为该文献定为活字印本提供了确切依据。^③将宁夏山嘴沟石窟发现的《妙法莲华经集要义镜注》,与上述国家图书馆

①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2册,第340页。

②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8“技艺·板印书籍”条,中华书局,1962年。

③ 孙昌盛:《贺兰山山嘴沟石窟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步研究》,《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

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51、71 和《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以及俄国和武威藏《维摩诘所说经》对比可知为同类印刷品，证明这些文献都是活字印刷。国家图书馆藏 3 种泥活字版佛经是新发现的泥活字印刷品类，有重要文献和文物价值。

四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的时代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包括了西夏时期、蒙古时期和元代，先后至少有 240 年，在国内外保存西夏文献的部门中，西夏文献时间跨度最长。

馆藏有两页瓜州审案记录，是西夏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070 年）瓜州（今甘肃省安西县）审理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笔录。这些稀见的文书对研究西夏早期的经济和法律很有价值。

馆藏有不少写本，其中以《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主，共 21 卷，皆是七八百年的古本，也十分珍贵。此应是西夏时期写经。

馆藏民国时期出土的西夏文献如上所述有蒙古乃马真时期刊印的《金光明最胜王经》。

元代刊印西夏文佛经事经过了一番周折。西夏灭亡后，党项人对于作为民族文化重要标志的西夏文还有感情，仍在保留使用。元政府为笼络少数民族上层，对此也提供了条件。世祖时曾下令雕刊河西西藏经板，准备印刷西夏文大藏经。史书上对此没有更多的记载，估计与当时西夏后裔“河西人”有较高的地位、忽必烈崇信佛教有关。此外当时帝师八思巴的弟子河西僧杨琏真伽备受重用，他投靠、贿赂权臣桑哥，担任江南释教总统应与此关系极大。而雕刊地点正是在杨琏真伽任职的杭州。世祖刚刚去世，成宗继位后很快停止了雕刊西夏文大藏经，其原因史书也未记载。若分析当时的政局也可看出其中的端倪。世祖忽必烈后期桑哥被罢黜，杨琏真伽重赂桑哥、擅发宋诸陵、取其财宝、戕人性命、盗诈钱财、掠夺田产等种种不法也被揭露，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追究其罪行，并抄没非法所敛财产。但忽必烈于第二年又给还其人口、土田，处分轻微。成宗即位后当年便实行了与过去不同的政策，至元三十一年（1294 年）十一月“乙卯，令河西僧人依旧助役”。这是专门针对过去西夏僧不服劳役而作出的规定，透露出新帝对河西僧人的不满。两天后又下旨“丁巳，……罢宣政院所刻河西西藏经板”。^①取消正在进行的雕刊西夏文大藏经的工作。可能考虑要把杨琏真伽以及少数不法河西僧人的恶行与整个被朝廷倚重的党项族分开，因此成宗不久又恢复了雕刊西夏文大藏经的工作，并于大德六年（1302 年）完成。这是我国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刻印的大藏经。武宗、仁宗又陆续印制，管理此事的党项上层有拥立武宗即位有功、仁宗时官为御史台侍御史的杨朵尔只等。^②元代刻印西夏文佛经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馆藏西夏文《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本母》卷 5、《悲华经》卷 9、《经律异相》卷 15 各有祝赞 4 面，祝赞中西夏文题款译文为“奉大元国天下一统世上独尊福智名德俱集当今皇帝圣寿万岁敕，印制一全大藏经流行，当今皇帝圣寿万岁，太后皇后与天寿等，奉敕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皇太子使见千秋，印大藏经五十部流行”。知此三卷经为元大德十一年（1307 年）印制。又《妙法莲华经》有祝赞 3 面，其中题款译文为“当今皇帝御印，仪天兴圣仁慈昭懿寿元皇太后御印，正宫皇后御印”。仪天兴圣仁慈昭懿寿元皇太后是元武宗和仁宗的母亲。知此经为武宗或仁宗时印制。馆藏元代西夏文佛经展示出元代刻印西夏文经的形制。又《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卷末有元皇庆元年（1312 年）西夏文发愿文，版间接纸处有刻工名“台周”。西夏文《金刚萨埵说频那夜迦天成仪轨经》的刻工中也有“台周”，尽管该经中没有记载刊印时间，也可推定与《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大致同时雕版。再有《金刚萨埵说频那夜迦天成仪轨经》的刻工有“周子俊”，而《不空罽索神变真言经》中也有刻工“周子俊”，也可证两部经是同时代的刻本。

《菩萨地持经》卷 9、《大智度论》卷 4 的版本形制与上述元代佛经相同，可定为元代版本。《妙法莲华经》虽与上述佛经版本有异，但卷首有祝赞 3 面，其中西夏文题款译文分别为“当今皇帝御印”，“仪天兴圣仁慈昭懿寿元皇太后御印”，“正宫皇后御印”，而“仪天兴圣仁慈昭懿寿元皇太后”系元武宗和仁宗母亲，

① 《元史》卷 17《世祖纪十四》、卷 18《成宗纪一》。

② 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世界宗教研究》1981 年 1 期，第 64~76 页。

知此经也是元代印制。《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下卷版式与《妙法莲华经》相同，也可推测为元代印制。

《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15、《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下卷、《地藏菩萨本愿经》中卷与上述形制有所不同，是否杭州雕印有待进一步考证。^①

五 国家图书馆揭裱出的西夏文、汉文文献分析

国家图书馆的专家在修复馆藏西夏文文献时，于层层裱糊的封皮中揭出了一批西夏文和汉文残页。在此次出版《中国藏西夏文献》时，西夏文残页已随所在主文献分别刊布于各册，汉文部分则集中置于第 12 册国家图书馆藏卷的后面。^②

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转来黑水城出土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封皮揭出的西夏文文献，无论是世俗文书还是宗教文献，都属西夏时期。其中少量汉文刻本佛经，不一定是宋代文献，也很可能是西夏文献。西夏王朝在使用西夏文的同时，也使用汉文；在刻印西夏文佛经的同时，也刊印汉文佛经。当然西夏也有宋朝和金朝刻印的佛经，例如黑水城出土的大批文献中就有宋朝和金朝的刻本文献。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中揭裱出的全部是汉文文献，国家图书馆林世田教授等对汉文文献作了考证和定名。他们认为：一、灵武出土西夏文献护封中所出汉文文献均是明代刊写，这既为确认这部分西夏文献的刊刻年代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即这部分汉文文献是明代修补西夏文献时放入进去的，还是明代印制西夏文佛经时放入的，还是二者兼而有之，这有待于对每一部文献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二、这批汉文文献有很多可能是同一版本。说明这批西夏文佛经的装帧或修复大致是在同一时期。三、这些汉文文献可识别的均为佛道二教文献，而佛教文献又占绝大多数，特别是佛教仪式文书，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断定其为某个寺院的藏书，因残缺而成为“废弃物”，后被寺院或经坊用来制作或修补西夏文佛经的护封。四、这批文献中有一些未入藏的藏外佛教文献，多是在佛事活动中应用的仪式文书，这对研究明代西北地区的民间佛教具有重要意义。五、苏联政府捐赠国家图书馆的《刘知远诸宫调》及其他黑水城汉文文献的年代，与俄藏黑水城文献大致相当，除《刘知远诸宫调》为金代刻本外，其他均为宋代刻本，有的甚至能从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找到相同的版本。^③这些认识很有见地，同时也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馆藏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既在各页面后有托裱，在封皮中又有衬纸。此经上下两卷经纸厚实，页面很少损伤，托裱的原因应是折面断开，以托裱的方式粘连各页面。但因托裱的纸张较薄，经常翻阅仍会在折叠处断开，日久不免前后错乱颠倒。此二经托裱用纸皆为西夏文佛经，从《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上卷析出的有刻本《菩萨地持经》卷 9 共 6 面，刻本《大智度论》卷 4 共 8 面；从《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下卷析出的有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19 共 13 面，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48 共 6 面；从两经共同析出的有泥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51 共 4 面，泥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71 共 44 面。

西夏文刻本《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上卷墨书汉文 4 行“发心表经释子李耳卜，上报四恩，下资三有，法界有情，同成正觉。师父李耳塞、母韦氏太平姐，舍纸王氏，亡过父李七什”。卷末裱纸上有西夏文墨书题款 4 行，译文为“师耳塞李，净信发愿者释子耳卜李（李慧胜），现在者韦氏，赐食者王氏，转身者李七什”。下卷裱纸上有两处西夏文墨书题款，皆 3 行，内容大体相同，一处译文为“净信发愿令经契全者耳卜李、现在发愿者纸此师母，赐食王氏，转身者父李七十”，另一处译文为“净信发愿令经契全者耳卜李、现在纸此者师母赐食王氏，转身父李七十”。这 4 条西夏文和汉文题款是同一人为同一事所书，系因佛经散乱而发愿裱经者所书，发愿裱经者名李耳卜，“耳卜”为西夏语音，译成汉文为“慧胜”，此人名李慧胜，西夏语称李耳卜或耳卜李，系一僧人。其父李七什，为转身者，即已亡故。李慧胜的师父是李慧净，西夏语称李耳塞，师母韦氏，名太平姐。汉文题款记舍纸王氏，而西夏文题款记施食王氏。两处西夏文题款记“纸此”，疑西夏文“此”字为“舍”字之误，此二字西夏文形近。书写题款的裱纸裱元代佛经，裱经时间当不是西夏时期，而可能是元代。推想当时在灵州尚有懂得西夏语文者，可以用西夏文、汉文书

①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3~6 册。

②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2、12 册。

③ 林世田主编：《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中汉文文献释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年，前言。

写题款，且所写西夏文行书字体熟练，但仍可见其有疏误之处，除上述将“舍”误写成“此”字外，在上卷的西夏文题款中，“韦氏”“王氏”的氏字都没有写成姓氏的“氏”，然而在下卷“氏”字又写对了。这是否说明当时虽尚有西夏文者，但有些生疏。

一方面《现在贤劫千佛名经》托裱的衬纸中无一纸明代佛经；另一方面包括《现在贤劫千佛名经》《金光明最胜王经》《慈悲道场忏罪法》以及活字版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在内的灵武出土佛经，封皮揭出的全是明代汉文佛经。这可否推论《现在贤劫千佛名经》的托裱和灵武很多佛经的修补封皮是两个时期完成的。《现在贤劫千佛名经》的托裱在元代，用的是西夏文旧经，当时还有懂得西夏语言和文字的人；而灵武很多佛经的修补封皮是在明代，用的是明代汉文旧经。明代是原建立西夏的党项族迅速走向消亡的时期，懂得西夏语和西夏文的党项人更加稀少。但从宁夏灵武所存西夏文佛经在明代仍能得到修复，特别是封面得以重新加固保护，可知当时当地对西夏文佛经仍然重视，或可推想当时还有少许懂得西夏文的西夏后裔。灵武是西夏故地，是西夏东部的重镇，这里的西夏后裔也随着历史延伸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西夏文佛经的修复或许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例证。

六 故宫博物院藏西夏文文献的来龙去脉

1974年我在故宫博物院著名金石学家罗福颐老先生事先安排联系下，到故宫博物院看阅西夏文物和文献。当时除看到院藏的西夏文印、钱、牌等文物外，还看到西夏文《高王观世音》1卷，并被允许拍摄了局部照片。此后我和白滨教授发表论文《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初步介绍、研究了此经卷。^①

此次出版《中国藏西夏文献》之际，我重到故宫博物院联系出版文献事宜，在罗福颐先生公子罗随祖先生和古书画部傅红展先生的帮助下，不仅复制到已经介绍过的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还复制了过去未介绍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74。^②

这两种西夏文文献，原为近代著名画家、篆刻家、文物收藏家徐宗浩（1900~1957年）收藏。徐先生字养吾，号石雪，祖籍江苏常州，久居北京，民国期间曾任北京古物陈列所顾问。1958年其家属将此两种文献捐献国家文物局，后调拨给故宫博物院收藏。

故宫博物院藏木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74，系1917年宁夏灵武县知事余鼎铭修城时，于城墙内所得西夏文文献之一种，其来源及其版本、价值已于国家图书馆卷综述中论及。^③国家图书馆也藏有木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74，但卷首无经图、祝赞牌，故宫所藏此卷则有经图一幅5面和空白祝赞牌1面。此卷末有北京广济寺主持现明所书后记，其开始称“己卯菊月二十三日无畏周居士携来广济寺，同观者江公宇澄、墀公宝惠、杨公韵伯，欢喜赞叹，生希有心，宏慈退隐现明谨记”。现明法师（1880~1941）俗姓王，号永芝，湖南省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人。1916年为京中诸山长老推举为广济寺住持，1924年创设宏慈佛学院，退居潜修。他两次修造广济寺，九次传戒，办佛学院六班，为当时名僧。后记所书“己卯”年观西夏文经为1939年，在其创立宏慈佛学院、退隐15年后，时年60岁，故书“宏慈退隐现明谨记”。

所记周居士周肇祥（1880~1954年），字嵩灵，号养庵、无畏居士，又名退翁，浙江绍兴人，清举人，曾任山东盐运使，湖南省财政厅厅长，署理湖南省省长，后任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晚年从事绘画，任东方绘画协会干事、委员，在北京主办中国画学研究会。该经册后附有周肇祥题跋2页，首记：“此西夏文佛经，出自宁夏，后入北京华古堂雨亭，为余收得。以《番汉合时掌中珠》及《西夏国书类编》考之，当为《华严经》卷74。华严法海，言博义深，遥荒小国，乃能译刊流布。”后引大德十年管主八在杭州印西夏文大藏经题记，并感慨：“西夏亡于南宋宝庆三年，大德初相距已七十余年，犹用其文字雕藏，何其文字之深固若是耶？”又简述西夏历史及文字创制使用史实，再记：“辽金元清皆外族入居中土，未闻以其国书译刊大藏，独西夏有此盛举，国亡之后犹能重刊印行，西夏虽亡而文字不亡，与元相终始，远至居庸

① 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考古学报》1977年1期，第143~164页。

②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2册，第369~408页。

③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册，第1~14页。

关至正八年镌刻五国书陀罗尼，西夏文尚俨然在列，岂不伟哉！”最后记此经：“叠折稍有损断，仍复粘修完好。封面黄绢，残缺处以明藏剩页缀补。”后署“中华民国第一戊寅六月十九日，佛弟子周肇祥谨跋”，再署“是卷计佛画三页经文二十八页，己卯夏六月……周记无畏”。可知此经曾由周肇祥所得，并于1939年携至广济寺与原主持、退隐僧人现明等人共赏，时年亦60岁。题跋中有“无畏”“肇祥”朱印。后转入徐宗浩手中。

故宫藏西夏文刻本《高王观世音经》为明代刊印。经卷后有发愿文34行，其中有年款，译文为：大明朝壬子须能斗盈五年正月十五日。根据壬子五年以及发愿文中“皇太子千秋依见”的语句，定为明洪武五年（1372年）。也有人认为“须能斗盈”是明代年号“宣德”的反切译音。然而明宣德时期壬子并不是五年，而是七年。刻印时间为“大明朝壬子”，查明朝壬子五年有二。一为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五年，一为明孝宗朱佑樞弘治五年。发愿文13、14行又载：“当今皇帝万岁俱来，皇子太子千秋依见。”据《明史·太祖纪》记载，朱元璋洪武元年立世子标为皇太子，洪武二十五年朱标死去。又《孝宗纪》载，朱佑樞在弘治五年三月立皇太子。此经刻印在正月十五日。可以初步定发愿文所指太子不是朱佑樞之子，而是朱元璋之子朱标。此经刻印年代也可相应断定为明洪武五年，即公元1372年。^①

文中发愿刻印者多为音译人名。其中姓氏□移訛、耶和、平尚等皆为党项族姓。这些党项人的后裔占发愿刻印佛经人数的绝大部分，特别是第一人党项人移訛氏官居都督，秩从二品，是高级军事将领。以他为首，这些党项人仍用本民族文字印制佛经，祈福禳灾。经卷文字整齐、清晰，字体流利、纯熟，证明西夏灭亡一个半世纪后，西夏语还是活的语言，西夏文作为党项族的交际工具还在本族中流传。这一经卷是党项人消亡前最后的历史见证之一，具有珍贵的文物和文献价值。

七 宁夏博物馆藏西夏文残木雕经板初识

1990年重修宁夏贺兰县宏佛塔时，发现大量西夏时期的残木雕板2000多块，现藏于宁夏博物馆。宏佛塔位于贺兰县金贵镇红星村东南，西南距银川20公里，距贺兰县城约9公里，始建于西夏，是一座砖筑三层八角形楼阁式、覆钵式结构的复合式建筑。西夏文木雕板皆出于宏佛塔槽室内，有的一面刻字，也有的双面刻字，多已碳化变黑。从字形大小看，可分为大、中、小三种，大多字体方正，刻工娴熟有力，其内容均为佛经。

这批木雕板过去从未系统刊布过，此次出版《中国藏西夏文献》将其全部刊印出版，一方面使这些重要文献公诸学界，便于利用研究，另一方面这些碳化的雕板残块，容易损伤，难以保存，印制刊布后能起到复制、保存原始资料的作用。

在木雕板残块中大字号雕版较少，仅7块，大小不等，多为一面刻字，每字约有1~1.2厘米见方，笔画较粗，行距6~8毫米，字距1毫米。其中有一件最大的雕板残块长13厘米、宽23.5厘米，一面刻字，版面中间有1厘米宽中缝，中缝两侧各竖刻6行西夏字，最长的一行有10个西夏文字，中缝上还刻有3个略小的西夏文字。雕板背面平整无字。中字号雕版数量最多，约占西夏文字雕板总数的一半以上，残块大小不等，其中双面刻字的雕板，一面西夏文字大小有1厘米，行距在6~8毫米之间；另一面字较小，有8毫米见方。所刻西夏文字方正秀丽，笔画细腻清晰有力。小号字雕板约占西夏文木雕版总数的40%左右，残板大小不等，字板厚1.5厘米，两面刻字，两面字体的大小基本相同，每字6毫米见方，字体娟秀，笔画较细。其中最小的残长和残宽不足1厘米，仅存一个字半边。^②

这些残木雕板皆残损过甚，且为反字，更难以释读，过去尚未译释出一种经名。此次出版之际，试译一些文字较多的经板，竟释读出6块，皆为中号字，分别为《释摩诃衍论》卷2（[10057]·021）、卷3、卷5、卷8、卷10。《释摩诃衍论》为《大乘起信论》之注释书，简称为《释论》，10卷，印度龙树菩萨造，姚秦筏提摩多译。本论就《起信论》的因缘分、立义分、解释分、修行信心分、劝修利益分等分，解释其

① 李范文：《关于明代西夏文经卷的年代和石幢的名称问题》，《考古》1979年5期，第472~473页；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再探》，《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95~622页。

②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3册，彩版，第69~308页。

意。第 10 卷性德圆满的思想，与密教极为一致。已释读出的 6 块残雕板涉及该论 5 卷的内容，估计当时已从汉藏翻译并雕版印刷了全部 10 卷。现将其中卷 8 一块经板文字相应汉文经文摘录如下，黑体字为残雕板相应的西夏文字。因西夏文和汉文语法不同，每行文字大体相符，但字数会稍有出入：

若此神咒诵四千六百五十遍已讫。即彼像中付**二字轮**。谓
若邪人付邪字轮。若**正直人付正字轮**。以之为别。言植
善林树因缘者。谓若为修彼止轮门人。自室前中植二种
大吉祥草故。云何为二。一者松木。二者石榴木。是名为二
言字轮服膺因缘者。谓若为修彼止轮门人。必当服[口]字轮
而已。服何处耶。谓方寸处故。以何义故必付此轮。谓此字轮
三世诸佛无量无边一切菩萨。大恩师长大恩父母大恩天地大恩
海故。此因缘故。为修止人当付此轮。如是因缘
虽有无量。而今此摩诃衍论中。明**第一因缘**。不明余者。举初
摄后故。如是而已。如本若修止者住於静处故已说成就止轮因缘门。
次说直示修行止轮门。就此门中则有七门。云何为七。
一者存心决定门。不生不灭。真空理中其心定故。如本
端坐正意故。二者不著身体门。能善通达此身空无。其本自
性不可得故。如本不依气息不依形色不依於空不依地水火火……

可见残雕板每行文字占足行的约一半，推算原每行 22 字左右，还可估算出原雕板的高度。宏佛塔集中存放大量西夏文木雕板，可能是西夏一印刷佛经场所，为一重要皇家寺院。

八 敦煌研究院藏新见西夏文文献

敦煌研究院收藏的西夏文文献很丰富，来源也很复杂。

1. 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敦煌文物研究所在 1959 年对大泉河东岸的元代舍利塔进行维修、加固时，发现了西夏文佛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1964 年我参加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联合组成的敦煌西夏洞窟考察组，随导师王静如先生到敦煌工作期间，曾见到上述西夏文佛经。1985 年刘玉权和陈炳应教授撰文介绍、研究《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①20 世纪 80 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因所藏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页面散乱，邀我整理。当时我依据寄来的照片将此经散乱页面依序连缀复原，基本完整，卷尾稍有残失，把整理结果交敦煌研究所，此次出版《中国藏西夏文献》得以全文刊布。

2. 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于 1988 年至 1995 年，对北区洞窟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出土不少文物，其中包括一批西夏文文献。^②主持发掘工作的彭金章教授委托我将出土的西夏文文献进行考证译释。因其多为残页，花费了相当一段时间至 1999 年才基本完成。译释、研究成果首先发表在《敦煌研究》2000 年第 3 期，后又按洞窟顺序刊布于彭金章、王建军两位主编的《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 1、2、3 卷中。

此次集结出版时，见敦煌洞窟北区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中，又有不少新的文献。如世俗文献中有北区 184 窟中的文书残片，其中有物品账残页数纸：B184：12-5（正）、B184：12-6（正）、B184：12-8（正）、（B184：12-9（正）；另外有钱物账残页 B184：12-10（正），有西夏文朱印 1 方；还有粮物账 B184：6，借贷文书 D752：-19。^③此外还有不少目前难以确定内容的文书残片。这些文书对于研究西夏社会、西夏时期敦煌社

① 刘玉权：《本所藏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版画初探》；陈炳应：《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译释》《本所藏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版画初探》，《敦煌研究》第 3 期（总第 5 期）1985 年，第 41~58 页；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 年，图版 375。

②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 年第 3 期，第 1~16 页；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 1、2、3 卷，文物出版社，2000 年，2004 年。

③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6 册，第 29~46 页。

会状况很有价值。

此外还有汉文文书，如一件借贷文书残页（B206:1v），仅存文字1行：“……本利三十七缗半，如限日不还，当承倍还。”又如一件嵬名法宝达卖地契残页（B59:1），上部残损，但仍保留不少内容，文书有3方朱印，其中两枚文字较多，应为官印，知此为红契。

佛教文献除过去已知的西夏文刻本《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大方广佛华严经》卷2、《金光明最胜王经》卷5等外，又发现又《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文殊师利问地经》《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44等。

活字本印本除已知的《诸密咒要语》《地藏菩萨本愿经》外，又发现有《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5纸8面[B59:75-2]、[B59:62-2]、[B59:62-1]、[B59:75-1]、[B59:62-5]。此外还有一纸《月灯三昧经》[B124:12]，仅存2行，但犹能看出明显的活字本特点。^①

有一页西夏文写本佛经为梵夹式[B121:28]。梵夹装起源于印度的贝叶书，后来藏族借鉴这种书籍装帧方式书写藏文，现在藏族称之为长条书。长条书由很多规格相等的长条纸页组成。在西夏书籍装帧中梵夹装很有特点。西夏文书籍的梵夹装不同于藏文的长条书，它是自右向左排行，自上而下竖写，这是由于两种文字书写方式不同的缘故。这种书纸质较厚，皆为两面书写。一种是写完第一面后，在背面继续书写。过去这种装式只见于黑水城出土的文献，现在敦煌也发现了这种梵夹装西夏文献，这是目前所见国内保存唯一的1页，高8.1厘米，宽31厘米，栏宽27.5厘米，一面左右双栏，西夏文字较小，有17行；另一面有西夏文较大，有15行。^②这种把用来书写横行拼音文字的长条书式改进成书写竖行方块字书籍的装帧形式，是西夏人的一种创造，目前这种书籍在世上是绝无仅有的。

3. 据说在敦煌一座元代塑像内发现一件西夏文佛经，另有原由周炳南收藏的“敦煌石室遗墨一百二十五种续编”中的西夏文文献残片，还有由辛普德收藏的“历代写经残片集锦”中的西夏文文献残片，以及钤有“任子宜”朱印的西夏文残片等。钤有“任子宜”朱印的西夏文残片中有刻本《慈悲道场忏法》等佛经。又有一纸刻本佛经[D.0208]，为卷尾2面，一面有西夏文6行，另一面为封底。6行文字两行是经末咒语，第3~6行译文为：

大朝戊午年九月十五日印毕

净信发愿者罗氏净觉

书者僧王宝幢

净信施主五百部印，发愿者都罗氏韩氏宜罗^③

“大朝”西夏文为“大界”，西夏文“界”“世界”可译为“朝”“朝廷”“京师”，这里应是指疆域很大的蒙古国。“大朝戊午年”，无年号。应是蒙古时期尚未有年号的时期，戊午年应是1258年，值蒙古宪宗蒙哥八年，时距元世祖忽必烈首建中统年号还差两年。发愿者中有都罗氏，“都罗”为党项大姓。九月十五日又是西夏的一个重要节日。《圣立义海》“九月之名义”中“善月中会”条：“九月十五贤圣聚日，禅僧兴日，君德民孝，敬爱皇王”。可知西夏灭亡30多年后，西夏后裔仍在佛教节日前刻印西夏文佛经，以发宏愿。

九 甘肃省博物馆藏新见西夏文文献

甘肃省博物馆藏西夏文文献来源也有多种。(1) 1952年发现于天梯山石窟的一批西夏文文献。(2) 1972年武威张义西夏修行洞遗址出土一批西夏文文献。(3) 发现于永靖炳灵寺石窟的12件墨写行草书体的西夏文陀罗尼和1件墨写正书体藏文陀罗尼。(4) 从“文革”中“破四旧”书堆中捡到的西夏文文献。

在世俗文献中除过去已知的《杂字》、会款单、欠款条、占卜辞、历日、医方和汉文、西夏文官府文

①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6册，第198~202页。

②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6册，第237~238页。

③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6册，第154页。

书外^①，又发现有多种西夏文社会文书残页，其中有光定午年（1222 年）告牒[15519]，系名为宝明的人所书，共 15 行，右下角残，末书“光定午年九月 宝明”。此外还有光定巳年（1221 年）告牒 [15389]、光定午年（1222 年）文书残页[15383]。

此外还有西夏文刻本劝世诗 3 面[13194：1]、[13202]，每面 6 行，每行上下两句，每句 7 字，诗歌体。如最后 8 句译文为：

由此男性苇骑马，不觉已老六十过。

荣弱两种如闪光，来来往往事真空。

岁岁买卖游山水，年年寻利无倦日。

凶？贪安弃佛道，物稀复随事真空。

今闻……^②

由末尾“今闻”二字知后面有跋文或后记。

佛教文献中除过去已知的写本西夏文《妙法莲华经》、陀罗尼、刻本《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大般若经》《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三胜之说缘》《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等外，又见有刻本《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2 面、《妙法莲华经》卷 7 共 2 面、《金刚般若波罗蜜经》8 面、《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40 共 2 面（40 卷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35 共 2 面。

还有一册西夏文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普贤行愿品》，是在“文革”初期所谓“破四旧”运动中，兰州市有些单位把收缴的古书刊、书画交到甘肃省博物馆，在一堆文献中有此西夏文佛经，被陈炳应教授发现、检出，并毫无保留地交给博物馆历史部库房登记珍藏。此经经折装，高 31.7 厘米，宽 12.2 厘米，上下双栏，栏高 24.4 厘米，页 6 行，行 17 字，与宁夏灵武发现的大批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形制相同。可知当时在用活字本印刷 80 卷本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时，还以相同的形制单行印刷了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普贤行愿品》。此经大体完整，前有疏序 8 面多，经文 56 面，后约缺 5 面。经文中前 12 面和中间偈语 5 面，在西夏字旁用墨笔书写对译的汉字，在天头时有眉批，指出西夏文和汉文文意或顺序之不同。显然后世有持此经者试图释读经文。^③

新见的写本西夏文佛经有：《佛说圣星母陀罗尼经》《德王圣妙吉祥之胜慧意盛用总持》等。《德王圣妙吉祥之胜慧意盛用总持》4 纸，其中 1 纸为经首，有经名，另一纸为经末，有西夏文年款“天盛己巳元年 月 日”，时为 1149 年。后有仁宗施经题款“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悖睦恭皇帝 谨施”，后复有年款“同年七月二十四日 竟”。这些款识对此批文物的断代具有重要意义。

十 武威市博物馆藏新见西夏文文献

1987 年 5 月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群众在亥母洞寺遗址施工中，发现一批西夏文文书，共 34 件，有世俗文献和佛教文献。1995 年我曾到武威博物馆考察，见到了出土的大部分文献。对这些文书孙寿龄先生曾作过介绍。此次集结出版又发现一些新的文献。

世俗文献中除过去孙寿龄先生识别出西夏文字书《音同》1 面，以及乾定申年（1224 年）贷糜契、乾定酉年（1225 年）卖牛契等外^④，此次我根据照片识读出乾定戌年（1226 年）卖驴契[6726]、乾定酉年（1225 年）文书[6730]以及[移合]讹慧宝告牒文书[6729]等。乾定戌年卖驴契记名为韩善的人，自愿卖掉驴子，价

①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遗物》，《考古》1974 年 3 期，第 200~204 页；王静如：《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考古》1974 年 3 期，第 205~207 页；史金波：《〈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质疑》，《考古》1974 年 6 期，第 394~397 页；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陈炳应：《西夏探古》——《武威历史文化丛书》之一，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 年。

②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6 册，第 255~256 页。

③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6 册，第 386~392 页。

④ 孙寿龄：《西夏乾定申年典糜契约》，《中国文物报》1993 年 5 期；史金波：《西夏粮食借贷契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论文集》第 1 辑（2004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186~204 页。

50 缗钱，现付 25 缗。唯此件前后所记时间不一，亦无当事人署名画押，可能是一件草稿或练习稿。^①大多数西夏文契约文书为草书，或较流利的行书，而此件为不太规范的行楷。这些西夏晚期的社会文书对研究当时民间的经济关系、社会习尚等都是宝贵的资料。其中两件盖有西夏文印章，是国内已发现的西夏文文书中少有的，对研究西夏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有重要价值。

佛教文献除孙寿龄先生释读出的西夏文泥活字本《维摩诘所说经》等外，此次又释读出写本《大千守护经中说五种守护吉祥颂》[6732]，此本线装，应是书脊在右，向右翻读，原有封面，经文共 106 面。另有写本《支贡大师十二时歌注解》[6750]、多种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6736、6735、6744、6737、6742、6748]、《佛说百寿解结怨陀罗尼经》[6747、6762]、《佛说调伏三灾经》《毗卢遮那法身顶相印轮文众生三灾畏怖命物取作恶业救拔经》[6764]、《星宿母陀罗尼》[6734]、《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6745]、《佛说佛名经》[6761]、《净国求生礼佛盛赞颂》[6749]、刻本《集颂》[6739、6746]等。^②以上佛经中有的为国内外西夏文经卷中所仅见，对研究西夏佛教经典和佛教在西夏的传播都有重要价值。

十一 内蒙古博物馆藏新见写本西夏文《佛顶无垢总持》

中央电视台在拍摄大型纪录片《望长城》的过程中，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遗址内发现了一批重要的西夏文物，有两尊彩绘泥菩萨像、多种西夏文佛经。中央电视台在播发此专题节目前，曾邀请我审看纪录片，对发现的文物进行鉴定。这次发现的文物后来交由内蒙古博物馆收藏。1993 年内蒙古博物馆翁善珍同志将此次发掘的西夏文文献、文物照片交我整理、译释，翁善珍同志又赴额济纳旗绿城遗址进行考察，后我们共同撰写文章，介绍了这些西夏文物的发现、内容和价值。^③

过去已介绍绿城出土文献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胜相顶尊总持功德依经录》《佛说消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慈悲道场忏罪法》封面等。2005 年为出版《中国藏西夏文献》重新复制照片时，又发现一种新的写本西夏文写经。我得到全部复印件，经翻译知为《佛顶放无垢光明入普门观察一切如来心陀罗尼经》，简称《佛顶无垢总持》。此经为宋朝时北印度僧人施护由梵文译成汉文。施护当时与从印度来宋朝的法天、天息灾在宋太宗的倡议和支持下，重建译经院，接续唐中期停顿下来的译经事业，法天、天息灾去世后，施护成为译经院的主译者。此经是施护翻译的密教经典之一。那时译场的布置参酌了密教仪轨，场内设一金刚界种子圆坛，分布诸尊种子梵字，称为“大法曼拏罗”。宋朝为表彰其译经的功绩，加给他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的官衔，并有帝释宫寺三藏传法大师赐紫沙门的称号。

此经无自汉文译为西夏文的译者款识，译者失名。缝绩装，有封面，题签“佛顶无垢总持二卷”，卷上 18 面，卷下 20 面，连封面共 39 面。面高 14、宽 17 厘米，每面一般 11 行，行 13 至 16 字不等，有时末行小字多达 18、19 字，甚至 20 余字。卷尾经题后有西夏文小字题款 1 行，译文为：亥年二月六日日写竟。末页背面西夏文题款 2 行，译文为：“宝塔匠人及发愿者行善康监富、真智，”“大宝[拶我]上师之手取敬现也”。发愿写经者为康监富、真智，可能此经原借自大宝[藏]上师。^④

此经为过去国内外所存西夏文文献中所无，是海内外孤本，且基本完整，属缝绩装，无论从佛经内容还是版本形制上，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特别是上卷有 4 面多陀罗尼，下卷有半面陀罗尼，这有助于研究西夏字、汉字、梵文对音，探讨西夏语音。此外还新见刻本《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残页、世俗文献军抄文书残页等。

十二 内蒙古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文文献的价值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于 1983 年至 1984 年，会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组成以李逸友研究员为

①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6 册，第 321~352 页。

②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6 册，第 395~456 页。

③ 史金波，翁善珍：《额济纳旗绿城新建西夏文物考》，《文物》1996 年 10 期，第 72~80 页。

④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7 册，第 84~122 页。

队长的考古队，对黑水城遗址进行全面、科学考古发掘，出土大量文物，其中文书近 3000 件，汉文文书数量最多，共计 2200 余件，还有西夏文、畏兀儿体蒙古文、八思巴字、藏文、亦思替非字、古阿拉伯文等多种民族字文书。这批文书是西夏至北元极为珍贵的史料，反映了黑水城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情况。

此次发掘出土西夏文书均为残页，共计 279 纸。20 世纪 80 年代李逸友先生将其中的《音同》残片 25 纸，交我和黄振华先生考证成文，在《文物》杂志上与发掘纪要和汉文文献考证研究成果一发表。^①90 年代中期李逸友先生又将所有发掘的西夏文文献委托我译释研究。当时计划将此次出土的汉文文献、西夏文文献和蒙古文等文献分别整理、研究后出书。汉文部分由李逸友先生先期完成，并已问世。^②我承担的西夏文部分 1999 年完稿，并交李逸友先生准备出版。不幸李先生于 2002 年溘然去世，出版事也有所延宕。此次集结出版刊布原件，基本上是新的文献，并通过综述和叙录作了简要介绍。

其中在《文物》上已经撰文介绍的西夏文《音同》残页，后又发现 4 纸，共 29 纸，分属于甲、乙两种版本，主要是乙种本。其中一纸是《音同》乙种版本中第 54 页（F6: W57），复原后可得大小字近 40 字，是国内外藏品中的孤本。

有西夏文《三才杂字》两纸。一残页（F57: W1/0849）存西夏文 6 行，前 4 行系“地章”的末尾，内容为“昆虫爬虫”类的一部分，后 2 行是“人章”的开始。又一残片（F6: W13）存西夏文 2 行，每行 4 字，两字一组。从其字词排列方式和词义内容看，是《杂字》“地”类的一部分。有《碎金》系 3 纸残页，一为序言（F6: W4），二为正文（F6: W5 83H28、83H57）。

有西夏文社会文书。一件是乙亥年贷粮（麦）契，较为完整。该契约立契时间：乙亥年二月五日，因无年号，所以具体年代不明确。西夏乙亥年有三：天祐民安六年（1095 年）、天盛七年（1155 年）、光定五年（1215 年）。目前所见西夏文书绝大多数是西夏晚期，因此推测此契约时间为光定五年。借粮人即立契人嵬移功合，嵬移是西夏蕃姓之一，文末签字画押处为“借麦接收者”，即此借贷人，他“因需要麦”而借贷；借贷者嵬移阿胜，借麦一石五斗；每月一斗中有一升半利，即月息 15%，如借半年利息即高达 90%，差不多翻了一番，这是典型的高利贷。契末记相借者子功合犬巴，即父亲借债，家里儿子也签字画押，若父亲外出或亡故，要父债子还。最后还有担保者名字。借者、相借者和担保者都要画押。^③此文契真实地反映了西夏的借贷方式和借贷关系，是西夏绿城一带社会借贷的真实写照。

有诉讼文书己卯年告状案（F79: W88），大小两件，书法、字体相同。皆残，原件应分若干条，大残片保存 3 条 10 行，前后两条残，小残片仅存 3 行，文末有年款“己卯年腊月二十九日”以及立文人的部分款识。内容为立文人叙述婚嫁中婚价纠纷，列出嫁妆总数，包括家中撒 10 石种子的耕地一块、牛马（马可能为衍字）10 头、羊 35 只、马 5 匹，反映了当时的婚姻制度和习俗。^④

户籍粮账系 1 残页，是以户为单位登记的纳粮账，记载了纳粮的具体种类和数量，反映了在西夏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农村缴纳租税的实际实施情况，对研究西夏钱粮赋税制度有重要参考价值。时间是“壬午年”，推测为西夏晚期光定壬午十二年（1222 年）。

有占卜文书一残片纸（F220: W2），楷行书，存西夏文 6 行，第 1 行上残，译文如下：

.....命男癸丑岁十月二十四夜丑时承庆
也，三命依本根四柱
年癸丑木 自身成柱
月癸亥水苗 日戊午火花
时癸丑木果 胎甲寅水根
大轮七 years 权巨蟹今记酉木宫住

①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队：《内蒙古黑水城考古发掘纪要》，《文物》1987 年第 7 期，第 1~23 页；史金波，黄振华：《黑水城新出西夏文辞书《音同》初释》，《文物》1987 年第 7 期，第 24~35 页；李逸友：《黑水城文书所见的元代纳怜道站赤》，《文物》1987 年第 7 期，第 36~40 页。

② 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文物出版社，1991 年。

③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7 册，第 153 页。

④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7 册，第 158~159、154 页。

其中“自身成柱”“苗”“花”“果”“根”字较小。^①西夏占卜由来已久，与其原始宗教信仰相关。早期党项人迷信鬼神，崇尚诅咒和巫术，盛行占卜。^②但在西夏时期已经接受了中原地区的占卜方法。武威张义下西沟岫出土一件以地支推断日期吉凶的占卜残片。^③此占卜文书残片为一生于癸亥年的男子算命，其中“四柱”是星命家以年、月、日、时的干支为八字排成四柱，即年柱、月柱、日柱、时柱，用以推断人的命运，称为八字推命术或四柱推命术。占卜时以每12年按照大轮出现相同的宫，按照小轮出现不同的行。此件中“大轮七年间巨蟹今记酉木宫住”即12年中的第7年，是巨蟹星宫，住酉木宫。此法源自中原，可见西夏也借用此种推命术作占卜。

宗教文献数量多，绝大部分为残页，种类有佛经、经文注疏、要论、经咒、发愿文、僧人名单、帛幡等，能查明文献的有西夏文刻本《大悲总持》《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大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调伏集义补》《大智度论》《地藏菩萨本愿经》《佛顶心陀罗尼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光明觉品第九》，另有《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佛说天散节下经》《慈悲道场忏罪法》《圣胜慧集颂经》等封面或封面题签。

此次发掘出土的宗教类文书反映了西夏佛教流行的盛况，其中不乏珍品。用泥金书写的西夏文佛经《大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是罕见书法精品。汉文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光明觉品第九》刻工刀法纯熟，字体方正端庄，堪称刻经上乘。

有一面《大般若波罗密多经》(F17: W7/0535)残片，右边有1行为小字汉文“大若二百二十三已”，“大若”当系《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的简称，此经当系佛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二百二十三”，系卷数，“已”为卷字的简写。此行汉字也是两经板连接处的经名(简称)。其后6行为西夏文经文，行18字，文字笔画自然朴实，刻工流畅。查汉文经典，果为《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223之内容：

……苦圣谛清净故耳界清净。耳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苦圣谛清净。若耳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苦圣谛清净故声界耳识界及耳触耳触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声界乃至耳触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苦圣谛清净。若声界乃至耳触为缘所生诸受清净。……^④

过去发现此经很多，但皆为写本。此经共有600卷，西夏是否刻印此经因未见刻本而难以定论。由此残刻本可知《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确曾雕印问世，这是举足轻重的1面西夏文文献。

在经卷残页中有多种西夏文活字印刷品，其中很多字四角圆钝，笔画不甚流畅，边缘不整齐，笔画古拙，缺少尖锋，有残断现象，文字大小不一，一行中字列不齐，有的字左凸，有的字右出，在多数行中有此现象，一行中上下字距离较宽，无相触、相交现象，栏框双线交角处不相连接，版心单线和上下栏线也不相连接，应是泥活字印本。^⑤这些十分珍贵的活字本再次证明西夏比较广泛地使用活字印刷。

目前国内外收藏的绝大多数西夏文文献已经刊布，并作了初步整理，有的还进行了初步研究，为今后的西夏和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必将大大推动西夏学的长足进展。但要看到，整理、研究西夏文文献，是一件长期的工作。一些文献尚未定名，特别是不少社会文书和佛经残片定名更为困难；对文献的译释、考证需要下更大力气，深入钻研。在此次出版中，我感到在编辑经验方面，多家合作协调方面，以及编辑排版技术性方面，都有待提高之处，希望今后能得到改进。^⑥

(作者通讯地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 100081)

①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7册，第154页。

② 《宋史》卷486《夏国传》；《辽史》卷115《西夏外记》。

③ 史金波：《〈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质疑》，《考古》1974年6期，第394~397页。

④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7册，第166页。

⑤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7册，第201~238页。

⑥ 此文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3辑，此次《西夏学》之《中国藏西夏文献》专辑出版，又作修改、补充发表。